

学校编码: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28820061152851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祖先·神明·民族英雄

——陈文龙崇拜与莆田玉湖陈氏家族的文化实践

Ancestor、God and National hero: Chen Wenlong Worship and The
Cultural Practices of Yuhu Chen's family in Putian

肖群英

指导教师姓名: 黄向春 助理教授

专 业 名 称: 人 类 学

论文提交日期: 2009 年 5 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09 年 6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09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蓝达居

评 阅 人: 刘朝晖 张应强

2009 年 6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肖群英

年 月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肖群英

年 月 日

摘 要

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宗族和民间信仰视为文化创造的产物,探讨二者在村落社会中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一取向已经成为考察传统中国地方社会组织形态和生活空间及其变迁的主要视角。本文亦选取这一视角,立足于人类学本位,结合文献解读,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前人的研究为起点,围绕陈文龙崇拜与莆田玉湖陈氏家族的关系,以陈氏家族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文化实践为脉络,分析陈文龙作为“祖先”、“神明”和“民族英雄”的多重象征意义的生成与层叠转换,讨论家族组织与民间信仰的密切互动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力与文化逻辑,为传统村落社会及其现代转型中的宗族和民间信仰研究提供一个个案解说。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前言”,介绍了本研究的缘起,回顾了以往对中国传统村落社会、宗族、民间信仰及莆田地方社会的研究状况。第二章简述了莆田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玉湖陈氏家族的概况,为后面的个案叙述做铺垫。第三章阐述自明代以来直到现今,在“国家”象征系统营造背景下,莆田地方士绅及玉湖陈氏族人对陈文龙崇拜内涵及表现形式的不断丰富和再造。第四章着重从续修族谱、祠堂重建、家族祭祖仪式三个方面,考察和分析玉湖陈氏家族的文化实践活动,以及不同支派在家族整合过程中的竞争。第五章探究了古山陈氏一族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在完善自身谱系的同时,如何把“祖先崇拜”与“神明信仰”整合于“陈文龙”这一象征资源的经营中,以此来提高其在玉湖陈氏家族中的地位。第六章“结语”,总结全文的主要观点,阐明本研究的意义,并对相关学术史作简要回应。

本文的研究表明,对陈文龙崇拜与莆田玉湖陈氏家族文化实践互动关系的梳理分析,既可以丰富我们对莆田地方史面貌的认识,也可以为重新思考和检视人类学对传统中国村落社会研究的诸多模型提供案例。

关键词: 陈文龙崇拜; 玉湖陈氏家族; 文化实践

Abstract

A growing number of scholars count up religion and folk beliefs as a product of culture, to explore expression of both of them in the village community. This orient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orm of lo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living space. In this paper, I also select this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y-based,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also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and put previous human studies as a starting point,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en Wenlong worship and Putian Yuhu family, which surname is Chen. Think skeleton of family Chen's cultural practice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analysis Chen Wenlong as "ancestors", "gods" and "national heroes" multi-layered formation and conversion, discussing about closely interact between family organizations and folk beliefs, and social motivity and cultural logic behind them. Provide explain to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society and its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folk beliefs and folk beliefs study.

The full text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describes the origin of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past status of the vill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religion, folk beliefs and Putian local research community. Chapter two, outlines Putian backgroun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side, as well as an overview of Yuhu family chen, to create matting for the cases described behind. Chapter 3, expatiate the local gentry and Yuhu Putian family Chen's worship towards to Chen Wenlong and the meaning of it, the continuing manifestation of the recycl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symbol during the period since the Ming Dynasty until the present. Chapter 4 focus on continuous genealogy, ancestral reconstruction and family sacrifice three aspects to analysis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Yuhu family Chen's, as well as the family competition between different branches in integration process. Chapter 5 explores Gushan family Chen improve their own lineage after the last century 80's, and at the same time , how it integrated "ancestor worship" and "divine faith" in the "Chen Wenlong" symbolic resources of the busines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Yuhu Chen family in the position. Chapter 6, "Conclusion", summing up main points of the full text , clarify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tudy, and making a brief reponse towards to

the relevant academic history.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analysis for Chen Wenlong worship and Putian Yuhu family Chen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al practices, not only enrich our outlook on the Putian awareness of local history, but also provide many models for anthropologists to rethink and review of the social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villages.

Keywords: Chen Wenlong worship; The Yuhu Chen's family; Cultural practices

目 录

第一章 前 言	1
第一节 问题缘起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3
第二章 莆田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玉湖陈氏概况	13
第一节 莆田的社会文化背景	13
第二节 玉湖陈氏：“一门二丞相，九代八太师”	15
第三节 玉湖陈氏分房及分布情况	19
第三章 陈文龙崇拜与莆田地方社会	23
第一节 城隍与二忠祠	24
第二节 “杨公太师”与陈文龙	26
第三节 民族英雄陈文龙	31
第四章 祖先崇祀与谱系建构：玉湖陈氏的家族发展	34
第一节 族谱：祖先的历史与家族的现实	34
第二节 祠堂：象征空间的建立与维护	45
第三节 祭祖：仪式传统与家族认同	50
第四节 系谱整合与“祖先的权力”	54
第五章 在祖先与神明之间：古山陈氏家族的文化资源	58
第一节 古山村概况及其家族组织的发展	58
第二节 “祖公”抑或“神明”：陈文龙崇拜在古山	64
第三节 “诞辰礼”：“祖先”与“神明”的合二为一	73
第六章 结语	80
参考文献	84
附 录	91
后 记	94

Contents

Chapter 1	Preface	1
Section 1	Issue root-cause	1
Section 2	Review the science history	3
Chapter 2	Background of Putian's social culture and circumstance of Yuhu Chen' family	13
Section 1	Background of Putian's social culture	13
Section 2	Yuhu Chen' family: "Two prime ministers in one kindred, eight premiers through nine generation"	15
Section 3	Housing and building distribution of Yuhu Chen' family	19
Chapter 3	Chen Wenlong admiration and Putian society	23
Section 1	Chenghuang God and Erzong Temple	24
Section 2	"Prime minister Yang" and Chen Wenlong	26
Section 3	National hero Chen Wenlong	31
Chapter 4	Ancestral sacrifice and pedigree building: the family development of Yuhu Chen' family	34
Section 1	Family pedigree: the history of ancestor and status of kindred	34
Section 2	Ancestral hall: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spacial signity ..	45
Section 3	Ancestral sacrifice: ceremonial tradition and family self-identify ..	50
Section 4	Pedigree conformity and ancestral might	54
Chapter 5	Between ancestry and gods: Gushan culture wealth	58
Section 1	Instance of Gushan country and its family's development	58
Section 2	"Ancestry" or "Gods": Chen Wenlong admiration in Gushan ..	64
Section 3	"Birthday ceremony": combination of "ancestry" and "gods" ..	73
Chapter 6	Conclusion	80
	References	84
	Appendix	91
	Postscript	94



图：玉湖陈氏祖祠及阔口、古山两村在莆田的位置

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问题缘起

本文作者在研究生一年级的课程学习中拜读了导师的博士学位论文《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述——明清以来闽江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与仪式传统》，文中详细描述了流行于闽江下游地区水上世界的一个主要民间信仰及仪式传统——“水部尚书”信仰及“迎尚书公”、“迎尚书船”的仪式系统，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兴趣。“水部尚书”，相传为南宋抗元将领陈文龙，兴化人，其誓死坚守兴化城的故事一直为莆田人民所传颂，且来看文中一段简述：

陈文龙殉难后葬于杭州西湖之畔，谥忠肃，与同葬此地的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忠肃”，在后世更是获得了“民族英雄”的称号。陈文龙以忠烈节义之名享祀于后人，当属民之常情，亦为史上所习见。对陈文龙的祭拜最早起于何时何地，现已难有确考，若按常理，在陈文龙的家乡及拒敌守节地莆田，最初由其族人或乡人建庙崇祀应较有可能。郑丽生《闽广记》言：“……文龙，莆田人，县之玉湖有二相祠，祀陈俊卿与陈文龙。文龙，俊卿之从侄也。又县城有二忠祠，祀陈文龙与陈瓚。瓚，文龙之从子也。皆建于明。”然而，在莆田对陈文龙的祭祀长期以来只停留在纪念家族先贤和忠义之士的层面上，并没有被进一步神化。反而是在与其英雄事迹并无太多联系的福州地区，陈文龙被“敕封”为“水部尚书”，对之的信仰和膜拜自明代以后在此地得以盛行，并作为“水神”而被大批水上信众所崇祀。^①

在该页中还有这样一条注释：在陈文龙的家乡莆田古山村，陈氏一姓聚族而居，祀文龙之祠亦称“尚书祖庙”，陈文龙在此既是祖先，也是神明。但据介绍，

^① 黄向春：《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述——明清以来闽江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与仪式传统》，博士论文精装本，2005年，第181页。

这一名称是在民国以来每年农历二月十六陈文龙生日古山陈氏赴阳岐尚书祖庙进香的制度建立以后才逐渐出现的。

从这段文字和这条注释中，可以得知几条信息：莆田对陈文龙的祭祀长期停留在纪念家族先贤和忠义之士的层面上，而在古山村陈氏一族，亦建有“尚书祖庙”，陈文龙在这里兼有祖先和神明两种身份，更为难解的是，古山陈氏自民国以来前往福州阳岐尚书祖庙“进香”这一行径。我们不禁要疑问，陈文龙即为古山陈氏“祖先”，又如何为其奉为“神明”？古山尚书祖庙与阳岐尚书祖庙是否存在“分香”的关系，何者为“根庙”，何者为“祖庙”？古山村陈氏一族为何要前往福州进香，这里有他们怎样的历史记忆，又表达了他们怎样的现实需求？陈文龙尚书公“水神”的身份是否亦是古山陈氏一族所奉祀的“神明”的身份？古山村陈氏一族又是如何消解和融合陈文龙“祖先”、“神明”、“尚书公”这三种身份的？

再则，文字所引“郑丽生《闽广记》言：“……文龙，莆田人，县之玉湖有二相祠，祀陈俊卿与陈文龙。……”，文中提及的“玉湖”这一地名，亦称“白湖”，今莆田荔城区阔口村，阔口村与古山村在地理位置上，隔着木兰溪南北相望。“二相祠”，今为“玉湖陈氏祖祠”，在2007年搬迁重建以前一直位于阔口村的地界之中。那么，阔口村与古山村，哪个才是陈文龙的旧居地？古山村陈氏在玉湖陈氏家族中分属哪一房，其在玉湖陈氏家族的发展史上有何特殊的地位，在现今莆田玉湖陈氏家族中有扮演怎样的角色？现今玉湖陈氏的其他房支是否也奉祀陈文龙为“神明”，为何只有古山陈氏一族前往福州进香？这其中又隐含着家族发展怎样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以上的种种疑问，既有关于家族分化整合、祖先崇拜的问题，也有民间信仰神明崇拜的问题，又处于家族复兴重建的热潮中，实践主体抱有怎样的文化心态和现实需求，应该是很值得我们去田野中好好体验、观察一下。

宗族作为一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亦是一个不间断的意义建构的过程。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在中国现今村镇的土地上，广大农村的百姓和地方权威对宗族模式有着不同的尝试，要通过宗族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要在什么意义之下来做出选择、解决问题，为研究对象所实践着，也为研究者所体验着。祭祖和拜神是中国乡村最重要的两种祭祀仪式，地方百姓和精英正是利用这些文化的、象征的资

源来确立自己在地方上的文化霸权、精英地位，了解这个再创造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把握了宗族复兴的某类模式，所以希望本研究能为宗族发展与民间信仰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个案解说。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考虑到本文行文的架构和理论方法的运用，这里拟从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研究、宗族研究、民间信仰研究及莆田地方社会研究四个角度出发，进行简单的学术史回顾，以期在后面的论述中能够有一个较完整的理论背景和学术氛围。

一、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研究

乡村是认识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场域，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就有不少西方学者、传教士以异文化的视角开始了对中国乡村生活的敏锐观察，著名的有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 H. Smith）、荷兰学者高延（de Groot, J. J. M）、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①，他们都把乡村看成是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而真正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进入中国村落的学者，最早当属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②（D. H. Kulp）在广东省凤凰村进行的家庭社会学调查，系统考察了凤凰村的经济、婚姻与家庭、宗教、人口及社区组织的情况，并创造性的提出了“家族主义”这个核心概念，他的研究对汉学人类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后来的一些国外汉学人类学家的研究大都建立在他的研究之上。

在西方社会人类学的影响和带动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一些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中国社会人类学者在“社区研究”的视野下对中国的村落社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都带有远大的学术目的，并就“个别村落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或如何概括中国国情”这一问题与西方汉学家展开了讨论。费孝通将开弦弓村视为一个由各相关的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

^①（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 年。de Groot, J. J. M.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E. J. Brill, Leiden, 1910.（法）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②（美）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

来的整体,并试图从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而后又提出“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礼制秩序”、“长老统治”等概念,理论性的概括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农村传统观念。林耀华则以“宗族”为概念,分析了中国的宗族组织及其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以及亲属关系的系统与作用。杨懋春有关台头村的研究描绘了一个村落社区的整体画面,除了把家庭生活和村庄内部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也开始关注村庄的外部,即集镇中村庄之间的相互关系。^①正是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方法研究视角造就了世界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中国学派。与此同时,西方学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立足福建广东两省的宗族研究^②以及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市场共同体理论^③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结构提出了两个主要的研究范式,弗里德曼的“边陲论”强调了福建广东的宗族组织特点部分是由远离中央的边缘地位造成的,施坚雅则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这两位学者都不约而同的反对直接将中国的村落当作中国的缩影,强调中国的村落研究应该注意探讨国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受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等人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类学社会学恢复以来,学者们都不再将村庄当作中国的缩影,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村庄与作为“中国”的关系上,致力于建构一个能够把具体的村落研究升华为对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认识的分析框架上。^④如:黄树民通过对林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人生经历的描述,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政治文化的改造。萧凤霞考察了国家权力下沉农村社会并建立行政控制的过程,指出在传统社会,中国的地方社区远离中央权力机构行政控制中心,因而具有较大的自主性。王铭铭运用“社区史”的方法,试图从一个家族社区变迁的历史中展现大社会的场景,

^①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省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aurice Freedman,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8; 中译本,刘晓春译,王铭铭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6。

^③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④ 郑海花、李富强:《人类学的中国乡村社区研究历程》,《广西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分析溪村陈氏家族如何形成、如何获得独立的地权、聚落分化、制度化的通婚地域和创造自己的社会经济组织，不仅“超越”了村落的空间，而且“充实”了“村落的历史”^①。于建嵘展示了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政府如何力图将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努力图景，同时也细致入微地描绘出国家权威政治在不断地下沉过程中，与乡村权威、乡村传统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的互动场景。^②此外的其他学者也立足于各自的个案研究，或以“文化实践”的研究方法，或以“社区史”的叙述架构，审视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从而将小村庄与大国家串联起来了。

总之，学者们对“乡土中国”的关注并没有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弱化，而是更加自觉的寻找“中国化”的理论表达方式，关注宗族及民间信仰的新发展，突破功能主义的局限，以历史的眼光关注中国村落社会的文化实践活动。

二、宗族研究

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宗族”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有关宗族的著述卷帙浩繁，所述及的内容如制度、文化、结构和功能等亦包罗万象。大致来说，在传统的中国史学研究视野中，家族组织是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组织，而人类学视角的介入则将宗族研究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普遍认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家族组织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学者葛学溥的实地调查研究，他根据家族的功能，将中国的家族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自然家族（natural family）、经济家族（economic family）、祭祀家族（religious family）及传统的或宗族家族（conventional or sib family），其功能性的分析方法，很快为中国的人类学者所接受。随后，林耀华更是开中国宗族功能主义研究之风气，他运用功能理论，以宗族为分析性概念研究中国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田野素材。如果说是林先生开辟了中国宗族研究的话，那

^① 刘朝晖：《超越乡土社会：一个桥乡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②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王铭铭：《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么弗里德曼则是将中国宗族研究推向汉学人类学，建构了库恩（Kuhn）意义上的“科学范式”，即中国宗族范式。弗里德曼翻译并辨析了汉人社会中“家族”、“房”、“分支”、“户”等概念，也以此建立了一个等级结构。他以林耀华等人的田野资料为基础，详细描述了汉人宗族内部的分支过程、社会分化、权力分配，拜祖仪式的结构，跨宗族间的关系等，将乡村社会、社会分化，宗族——国家关系等视角带入了中国宗族研究，使有关中国宗族研究的探讨更加深刻而富有历史感。

尽管弗里德曼的“边陲说”被批评是回到了非洲的宗族范式，即把宗族看成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然形成的社会共同体组织，但在其之后，学者们开始广泛关注国家/社会框架下宗族组织的角色扮演和意义作用，将宗族作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组织、社会结构和文化变迁的基本途径和主要窗口。对宗族与国家的关系，学者们普遍认可了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的宗族是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复杂文明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中形成的，其生成、发展及至现代的变迁，都是受国家力量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宗族也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制于国家，作为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历史穿透性的村落共同体，宗族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迎合或是抵制国家的力量存在于广大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形式多样。王铭铭通过福建的塘东村、美法村和台湾的石碇村的比较以及溪村家族的个案剖析，对家族文化的本质、家族的权力配置、村庄的治理结构、家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功能、社会合作与整合机制作了文化人类学的透视，详细分析了农村互助关系的复兴对血缘家族势力的强化作用。还有不得不提及的刘志伟、萧凤霞、科大卫在珠江三角洲从事的一系列宗族问题研究。他们将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发展还原到地区社会历史背景中，透过历史文献的解读和田野调查中鲜活的体验，科大卫讨论了宗族是明清社会变迁过程的一种文化创造，宗族礼仪的推广结合了地方认同和国家的象征资源；刘志伟以番禺沙湾何氏宗族积极重构祖先谱系的例子，揭示了宗族历史的叙事结构和社会文化意义，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①

^① 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刘志伟：《族谱与文化认同——广东族谱中的口述传统》，《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

宗族“复兴”以后，宗族组织、宗族文化在现代/传统话语中的“旧”与“新”也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探讨。“旧”，即宗族内在的深层结构，诸如族谱、族坟、神龛等表层形态在改革开放前被销毁了，但内在的深层结构并未遭到破坏。深究这一深层结构，它可能是郭于华认为的“亲缘关系”^①，可能是钱杭认为的“从宗族派生出来的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是一种‘本体性’的需求”，也可能是“慎终追远”的文化心理，还可能是功能的需求，学者们都有精彩的个案论述。“新”，即学者们认识到复兴后的现代宗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传统宗族的翻版，形态、内涵上均已发生了变化。是不是说修了谱、重建了祠堂，宗族就重建了呢？宗族组织形式、人员构成、经费来源都有了新的变化，且不同区域背景、不同区域文化中的宗族重建形式及所运用的象征资源还不尽相同，这些都是活生生存在于广大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钱杭关于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的个案研究就十分详细的都考察了这些疑问和现状，泰和在钱杭的描述中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宗族乡村，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的顺利转型中。^②

总体上，人类学意义上的宗族复兴研究倾向于将其看做是宗族组织的重建和“创造”，既探究实践主体如何对文化传统及仪式的选择性的“复制”，又关注他们是如何结合需要进行“创新”和文化的“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对于“宗族”的认识也更加“开放化”，“宗族”这一概念在中国宗族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及其研究史上，不仅仅是传统的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了，而是添加了许多“超宗族”的因素，了解这些因素对于了解一个社区或村落的宗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民间信仰研究

人类学意义上的民间信仰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顾颉刚先生、费孝通先生对民间信仰活动的关注，顾先生通过对北京妙峰山香会的考察，分析了各种人对碧霞元君女神的朝拜心理，发现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和祈福心理的关系，费孝通先生也关注了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活动，探讨了灶王神等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信仰的解禁，越来越多

^① 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

^② 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论文摘要库